

◀ (上接 10 版)

子都说明中国前现代文学中已滋长着某些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已具备朝现代转化的内在机能,而现代文学也并非横空出世,跟自身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这也说明,只有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方能把握其中古今演变的轨迹。

除了对文学中“人性”发展的内容的探讨,《新著》也表明:“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突破。”(页 2)所谓“形式”并非一般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戏曲小说,这些都属于“体裁”,因此跟我们惯常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不同。《新著》说:“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语言所构成的体系。而作品的内容(包括感情)则不但是由形式所体现,而且形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内容本身。”(页 11)比方说李商隐《锦瑟》一诗从“锦瑟”至“惘然”这 56 字即为“形式”,其艺术特点存在于这一首诗的语言结构之中。这一以语言与结构为基础的“形式”观与当下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其实也是章先生自身的理论传承与学术训练的结果,在理论方面博采众长,从马克思、鲁迅到胡风都可看到影响的印痕,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从陈寅恪先生到蒋天枢先生以及他们所传承的乾嘉学派诠释谱系,给章先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还有待探讨。这里可举 1992 年发表的《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一文为例(《不京不海集》,页 25—31)。从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出发讨论李

白的两次入京、三次婚姻,并涉及与子女在内的感情生活,不仅对于这首诗以及相关的其他诗作都须作结构性细读,也必须把李白全部作品作为整体来考察,整篇文章体现了语言与结构的意识与分析技艺,在乾嘉学派的基础上显示出近代科学的方法。并非偶然,在解释李白的婚姻与社会地位和氏族的关系时,章先生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虽然这篇文章并非分析诗的艺术特征,但语言与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美学范畴的分析。

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并互为影响,《新著》通过大量分析实例阐述了文学形式包括各种体裁的演进,指出“艺术形式的逐步丰富与完善,其最根本的推动力,乃是人性的不断发展。由此所导致的感情的不断丰富、细致、强烈及其相互冲突的更为尖锐、急剧,也就要求并推动其表现形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页 15)。对形式的强调更看重人性的历史开展过程中对人性自身的深刻认识,从而要求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尤富启迪。如美国“新批评”派对作品的形式分析趋于极端,甚至排除作者生平信息或社会脉络,俄国形式主义也出现过类似倾向,以致后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等人起而纠偏而强调美学的社会功能。章先生的关于人性激烈冲突与尖锐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阐述多半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主张有关,当然这样的人性必定与社会条件丝丝相扣,因此相较新批评与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纯形式倾向是高一筹的。

贯穿着“古今演变”的问题意识,《新著》含有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视野,其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书写法对于一部现代文学史也有示范垂则的作用,当然现代文学的发展样态应当是

更为复杂多样、更为波澜壮阔,且必定带有自身的特性。

自 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研究以来 10 多年过去了,他离开我们也 5 年有余。先生在生前设立了古今演变的专业学科,与谈蓓芳教授合带研究生,到现在这个学科包括毕业和在学的已经有十六七位硕士和博士。另外章先生与陈思和教授在《复旦学报》上开设专栏和召开国际叙述研讨会等形式,使得古今演变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入人心,现在已经变成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这是很可喜的,当然这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实践,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现象,不过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这十几年里全球化大潮中学术生态迅速变化,新媒体开启新思维,数据库等在改变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方式,信息流通与学术交流空前频繁,在国际会议的议程上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占据前沿潮流,这么看古今演变的观念普及也和这样的大环境有关。比方说这几年“世界文学”是个热词,哈佛大学的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主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一书,前几年出版了中译本,他说在全球时代一向局限于个别国家比较研究的“比较文学”已经跟不上形势需要,因此主张以“世界文学”的观念取而代之。这正是学科整合变化的表现。同样在文学创作方面,2017 年 11 月我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论坛时发现,作家们普遍觉得汉语写作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对汉语写作的世界性表达了自信,这些都体现了世界视野与汉语的主体意识。今天我们重读《鸿沟》一文的开头,首先章先生是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

的呼吁的,然而他强调:“作为文学史宏观研究的先决条件,是文学观念问题。”(《不京不海集》,页 571)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这一“对接”十分关键,如果中国文学不是作为“整体”,就谈不上主体性。如章先生所论证的,“人性”并非外来之物,尤其中国的近世文学含有自我更新并走向现代的能量,实即确立了“中国特色”,因此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促使他提出打通古今文学的,正如《宏观与微观》和《鸿沟》等文中一再表明的,是针对当时学界流行“断裂”或“飞跃”的说法:“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说,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有些学者则将它说成是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形成的飞跃。”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似乎言之成理,但都缺乏证据。他明确表示:“与‘断裂’说的意见不同,我认为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传统从未断裂过”,但这里的“传统”并非作为主流的儒学传统,而是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谓“攫人心”功能的文学传统,实即更具生命力的常具反抗性的“传统”。章先生认为“人性”本来就酝酿于中国文学之中,尽管历尽曲折,对自由与解放的渴念与奋斗从未消歇,到近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而出现“飞跃”的态势。问题在于章先生通过具体论证把“人性”置于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坚持鲁迅所代表的“人性的解放”精神,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关于“五四”的“现代”迷思。

的确,1980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就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呼声,然而关键在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式。我们再来看《鸿沟》一文,在主张从现代文学来发现古代文学中富于生命力的文学链接时,先生举了朱自清《荷塘月色》与梁元帝《采莲曲》的例子,另举了龚自珍《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例子。在主张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与古代文学的联系时,举了巴金《家》与《红楼梦》、戴望舒《雨巷》与李璟《浣溪纱》的例子。或许对这些例证或解释可见仁见智,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文学的“整体”存在,其实自 1980 年代起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李梦阳与

晚明文学新思潮》等一系列文章,都在不断发现与评价古代文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文学传统,而提出古今演变可说是对自己的研究实践的一种理论化的表现。中国文学“整体”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打通了两头,摆正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当然给文学史研究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者——带来挑战,要求开拓视野,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同时具有一种参与建构当代新文化的实践意义。

围绕“整体”观念,章先生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处处闪现其“辩证”思维之光。所谓古今演变本身旨在消解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古今,对于新旧、雅俗、现代与传统这些相通的概念也具此意义。长期来古今文学之间的分界,不仅由于学院学科所致,从更深层面来看,也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之类的二元思维结构所造成的。我们今天年轻人学习古代诗词、书法等传统文化蔚成风气,因此在当下学习古代文化传统的热潮中来看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就愈加觉得亲切。那时候,如果有人声称要学做旧体诗词,那简直不可思议,无形之中属于一种禁忌。长期以来把古代文学看做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使之教科书化或博物馆化,给人观赏或批判,要学习的话是学习阶级斗争或现实主义之类。而章先生提倡打破古今,立足于当下,把文学回归到感情、美感,把文学传统变成生活和创作的源头活水。我们来看《宏观与微观》中一段话:

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从怎样的文学观念出发的问题。而在我看来,我们之作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既必须与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又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背道而驰。否则,我们的宏观研究就只能导致以下两个结论中的一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越来越走上了死胡同,或者,中国文学以前一直走在错路上,到了某一阶段(例如五四运动时期)才走到正路上来。而这两个结论显然都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不京不海集》,页 571)

章先生所说古今的“今”,从文学史研究来说指现代文学,也常指“现当代”,上面这段话中则明指“当前的文学发展”,由是把古今关系置于当下进行时,或未来时,其中充盈着普遍人性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包括当代生活的精神

(下转 12 版) ▶



章培恒先生给独立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陈建华授课